

◎ 张虹 浦玉生 窦应元 主编

水滸爭鳴

第十六輯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

中国水浒学会 盐城市水浒学会主办

水滸爭鳴

第十六輯

耐庵故里论水浒

主 编 张 虹 浦玉生 窦应元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争鸣. 第16辑 / 张虹, 浦玉生, 窦应元主编

- 郑州: 中州古籍出版社, 2016.3

ISBN 978-7-5348-5989-2

I. ①水… II. ①张… ②浦… ③窦… III. ①《水浒》研究

-文集 IV. ①I207.41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45231 号

出版社: 中州古籍出版社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 450002)

发行单位: 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江苏星宇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张: 18.5

字数: 350 千字

印数: 1-4000 册

版次: 2016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6 年 3 月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张弦生 王建新

装帧设计: 望 海

责任校对: 浦玉英

定价: 5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目 录

纪念容与堂本《水浒传》发现 50 年	余大平(1)
施耐庵“至顺辛未进士”考辨	黄同诞(5)
施耐庵是新诗作家	董志新(12)
张国光的金圣叹及金评《水浒》研究述评	周锡山(21)
谈谈郭武定本和繁本系统的两个支系	张 杰(31)
从水浒故事政治心态的变迁看《水浒传》的成书时间	许勇强 许见军(49)
英雄要问出处	杨林夕(55)
试论《水浒传》的几种复仇模式	张 燕(63)
《水浒传》中丈夫形象论析	王建平 梅登科(69)
金批《水浒》的环境描写理论	王路成(79)
除暴安良、行侠仗义	高春丽(88)
浅析《水浒传》中的“石碣天书”	熊臻臻(93)
琐议《水浒传》内外的燕青	石 麟(103)
杨志缘何激不起受众的英雄气	单长江(114)
浅析武松形象	石 松(122)
浅说水浒英雄林冲的 B 面	朱健文(127)
浅议贯华堂原本《金圣叹七十一回本水浒传》的人名避讳	孙亚琼(140)
《水浒传》“强盗”说给强盗听的强盗书?	黄 锬(145)
反抗与自由	李 云(149)
浅析《水浒传》之情节结构	胡 煥(155)
论《水浒传》招安叙事背后的时代语境	单 怡(161)
水浒“义”文化刍议	陈晓霞(169)
时迁为什么被排在倒数第二位?	刘传录(174)
水浒“梁山英雄”名实考辨	裴一璞(176)

浅析《水浒传》的武侠小说特征	吴玉平(181)
老梅新花	马 达 张弦生(189)
尊重历史 存真求实	陈麟德(193)
学识诚可贵 学品价更高	莫其康(198)
在为《施耐庵传》正本清源的幌子下	浦玉生(208)
《重修二圣庙记》碑发现经过及在水浒研究中的价值	曹先锋(217)
“据”说宋江	丁永林(222)
简论盐城地域的湿地文化特征	王登佐(230)
盘沟大圣与泗州大圣	卢 明(234)
方腊被擒“帮源”“梓桐”溯源	赵永泉 丁 霞(237)
话说《水浒传》中的几个女人	赵 萍(243)
行者悟空对行者武松形象塑造的影响	赵春阳(251)
接受视野下经典名作的续作研究	孙 琳(256)
众里寻他千百度	刘兆清(264)
结在藤蔓上的硕果	管国颂(266)
千山万水走过	周玉奇(273)
长篇人物传记《施耐庵传》的社会影响综述	陆 轶(277)
《施耐庵传》《罗贯中传》作品北京研讨会综述	浦海涅(280)

纪念容与堂本《水浒传》发现 50 年

湖北大学 余大平

《水浒传》成书到现在大约有 400 多年了。我们发现容与堂本《水浒传》的时间也已经过去了整整 50 年(1965~2015)。容与堂本《水浒传》的发现,对后来《水浒传》的学术研究,对当代社会的政治文化活动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,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。

在《水浒传》的传播历史上,由于金圣叹评改的《水浒传》删除了宋江投降打方腊的内容,受到读者长达 300 余年的热烈追捧,并逐渐将《水浒传》其他的版本全部淘汰。以至于郑振铎先生在他 1929 年撰写的《〈水浒传〉的演化》一文中感叹:

“(金圣叹评改本)却打倒了,湮没了一切流行于明代的繁本、简本、一百回、一百二十回、余氏本……使世间不知有《水浒传》全书者几三百年。《水浒传》与金圣叹批评的七十回本,几乎结成一个名词,除金本外,几乎没有所谓其他《水浒传》。”

在这些被淘汰的《水浒传》版本中,包括了容与堂本。

直到 1924 年,人们才发现了几部 120 回的《水浒传》和几部不完全的 100 回的《水浒传》。这年 2 月 9 日,鲁迅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:

“听说李玄伯先生买到若干本百回的《水浒传》,但不全。先生认识他么?我不认识他,不能借看。看现在的情形,百廿回本一年中便知道三部,而百回本少听到,似乎更难得。”(见《鲁迅书信集》)

从 1924 年起,陆续有人将这两种版本的《水浒传》翻印出版。但是,由于 300 年来人们习惯了阅读“金本”《水浒传》,加之 120 回本中加入了与水浒故事没有多大关系的田虎、王庆的故事,受到读者的诟病;加之 100 回本残缺不全,虽经挖补、移植使之“完整”,但仍然遭到读者的怀疑;加之当时战乱频仍,社会动荡,民生凋敝,它们的出版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。

新中国建立之初,几位研究《水浒传》的专家学者坐在书斋里搞阶级斗争。他

们给金圣叹戴上一顶“反动封建文人”的帽子,将“金本”《水浒传》予以封杀;然后稀里糊涂地大量出版 120 回的《水浒传》;100 回本由于找不到完整的本子,很少出版。(详细资料见拙文《封杀金本《水浒传》纪事本末》,载《水浒争鸣》第十三辑。)

直到 1965 年,北京图书馆收藏了一部插图内容与堂刻李卓吾批评《忠义水浒传》,容与堂刻本在国内才被发现。这部 100 回的《水浒传》,是在明万历三十八年(1610 年)由杭州容与堂刊行的。至于北京图书馆是如何收藏到这部书的,北京图书馆当时没有做任何说明,后来也没有。当年 12 月,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将这部书影印出版,并在其《出版说明》中说:

“不久前,北京图书馆收藏了一部完整的容与堂本,即现在这部《明容与堂刻水浒传》。我们拿它和日本内阁文库藏的容与堂本的照片对照,发现它们同属一个本子,但日文库藏本是经过挖改而后出的。因此,这部北图藏本可能是现存最早百回本中比较完整的本子。”

第二年,即 1966 年,这部书就与读者见面了。但是,当时全国上下正在酝酿“文化大革命”,整个社会对这部书的出版似乎反响不大。然而 9 年之后(1975 年),这部书就赶上好机会了。

1975 年,一辈子喜爱“金本”《水浒传》的毛泽东,针对 100 回本《水浒传》发表谈话,批判它是“投降主义教材”。(详细资料见拙文《〈水浒传〉伴随毛泽东的革命人生》,载《水浒争鸣》第十五辑。)于是,中国大陆有头有脸的出版社便乘机以“大批判材料”的名义,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出版的《明容与堂刻水浒传》排印出版,向全国广泛发行。在极短的时间内,容与堂本《水浒传》便在中国大陆老百姓当中广为“普及”了。这真是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——“福兮祸所倚,祸兮福所伏。”

记得当年在全国开展批判“投降主义教材”的时候,我还在大巴山中嘉陵江边一所铁路中学里教书。有一天,驻校“工宣队”的负责人找到我,很严肃地说:“你这个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,为什么不参加批判投降主义教材?”我非常委屈地说:“没有《水浒传》,怎么批?”没想到第二天,这位负责人将一套刚出版的排印本《明容与堂刻水浒传》交到我手上,说是送给我的,不要钱。希望我不要辜负工人阶级的信任,积极参加批判“投降主义教材”的运动。几天以后,我在全校老师政治学习的大会上作了批判“投降主义教材”的长篇发言。结果评价很惨——故事

讲得还精彩,但是批判不深入,还流露了同情宋江的不健康思想。

对于这种批评我并不在乎。因为在此之前,我从未完整、仔细地阅读过《水浒传》。当年在大学读书,成年累月不是参加“工作队”搞运动,就是搞劳动,上课、读书的时间很少;即使读书,也得悄悄地,否则,一顶“只专不红”的大帽子就会扣到你的头上,那可不是好玩的。如今,我得到了一部向往已久的书,捧在手里,散发着幽幽的书香,还不要钱,正沉浸在天上掉馅饼的兴奋之中,哪里还顾得上别的。

这一时期《水浒传》的传播历史,想起来总觉得有点怪怪的——删除了投降内容并风行了 300 多年的“金本”却在“阶级斗争”的口号中被封杀;完整保存了投降内容的 100 回本却在批判投降的运动中传遍天下。都说历史是公正的,可是我怎么看这段历史都像是“葫芦僧乱判葫芦案”。

再往后就更乱了——

改革开放以后,中央电视台以 100 回本(容与堂本)为底本,摄制了电视剧《水浒传》,赚了个盆满钵满。可是其中宋江那匍匐跪地乞求招安投降的形象,叫人看了实在不舒服。据说有的电视观众气愤得把电视机都砸了。

我随手查了查有关材料,发现在那些坚决主张以 100 回本为底本摄制电视剧《水浒传》的专家当中,有不少人是当年曾经义愤填膺地批判过“投降主义教材”的。如今,这些人改变自己“学术思想”的速度,那是比他们翻书还要快啊。

后来有人重拍了电视剧《水浒传》,但是除了强调“兄弟情”外,宋江那令人憎恶的投降形象并没有根本的改变。

大约从 20 世纪末开始,社会上出现了一股“批判”《水浒传》的风潮:发表了一批批判《水浒传》的文章,出版了几部批判《水浒传》的“专著”。而且,有几位批判《水浒传》的“专家”一时间声名鹊起,蹿红江湖。概括起来说,这些文章和著作诋毁梁山一百单八将是“土匪强盗”,是“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”;他们污蔑梁山好汉“摧残生命”,“蔑视人权”,“破坏国家法制”,“反政府”,等等。这些文章和著作,看上去似乎说得有理有据,头头是道,其实他们是用现代文明去批判古代文明,这是非常不合理,非常不科学的。

这股风潮发展到极端,就是美籍华人刘再复在他的《双典批判》中宣称:《水浒传》和《三国演义》是中国自古以来“最坏的两部书”,是“把中国人引向地狱之门”的“大灾难书”。

这一阵子,从国外到国内都在呼吁“维稳”。于是,有人便联想到《水浒传》中

宣扬“路见不平拔刀相助”，“为朋友两肋插刀”，“杀去东京，夺了鸟位”，认为读者读了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安定。还有人因为怀疑《水浒传》中“劫富济贫”的思想，从而怀疑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。这种早就被批判得臭不可闻的文学艺术的“庸俗社会学”观点，居然也能沉渣泛起，招摇过市，并且招来不少的“粉丝”。

容与堂本《水浒传》的发现，在《水浒传》的传播历史上是一件大事。一转眼，已经过去 50 年了。兹列举几条与这件事有密切关系的历史材料，几经钩沉整理，以资纪念。（2015\09\10）

施耐庵“至顺辛未进士”考辨

盐城市大丰区教育局 黄同诞

大丰白驹施耐庵,《施氏家簿谱》、白驹《施氏祠堂》木主、《施耐庵墓志》、《施让墓志铭》等均载其为元至顺辛未进士。这一点学术界争议较大。因查《元史》,至顺辛未无科,疑其为作伪。但刘冬先生在《浙江通志》中发现有“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”的记载^①,欧阳健先生又检索到杨观是至顺二年进士的记载,使施耐庵“至顺辛未进士”不再是孤立的记载,而是有了佐证。

《浙江通志》卷一百二十九记载:

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:张宗元(开化人),刘基(青田人,御史中丞),徐祖德(青田人,中书省管局),叶颙(青田人)。

杨观:元钱惟善《江月松风集》卷十二有《杨隐君挽诗》,诗前有小序曰:

君讳亮,字明叔,上饶人。其子观,登至顺二年进士第,授饶州录事,再授翰林检阅而君卒,学士揭公志其墓。

如此则“至顺辛未进士”见于记载的已有:施耐庵、余阙、张宗元、刘基、徐祖德、叶颙、杨观等七人。

此外,《浙江通志》还记载:至顺三年壬申有进士宇文公谅。

《浙江通志》现存三种本子,分别是明嘉靖版、清康熙版和清光绪版。

嘉靖《浙江通志》未载明以前进士,说:“自唐宋及元,其以进士举者彬彬然盛,盖四千有奇矣。各载郡县志,不能悉书。”

康熙《浙江通志》卷二十九载元进士有黄潛等 51 人,其中有刘基、叶颙、徐祖德,还有施耐庵的好友鲁渊。未记科举年份。并说明是录了部分,“余各具郡县志中,不尽载云”。

记载“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”的是光绪《浙江通志》。很明显,这个本子的选举志尽可能地采集了郡县志的记录,记载比前两种本子更为完备。

元朝自仁宗延祐以后开科举,逢子午卯酉三年一试。《元史》《志第三十一》记:

延祐二年春三月，廷试进士，赐护都答兒、张起岩等五十有六人及第、出身有差。

五年春三月，廷试进士护都达兒、霍希贤等五十人。

至治元年春三月，廷试进士达普化、宋本等六十有四人。

泰定元年春三月，廷试进士捌刺、张益等八十有六人。

四年春三月，廷试进士阿察赤、李黼等八十有六人。

天历三年春三月，廷试进士笃列图、王文烨等九十有七人。

元统癸酉科，廷试进士同同、李齐等，复增名额，以及百人之数。稍异其制，左右榜各三人，皆赐进士及第，其余出身有差。科举取士，莫盛于斯。后三年，其制遂罢。又七年而复兴，遂稍变程式，减蒙古、色目人明经二缘，增本经义；易汉、南人第一场《四书》疑一道为本经疑，增第二场古赋外，于诏诰、章表内又科一道。此有元科目取士之制，大略如此。

天历三年即至顺元年，元统元年即至顺四年。按元史记载至顺二年无科。

《元统元年进士录》记录了该科录取的百人名单：

蒙古、色目人第一甲三名：同同、余阙、寿同海涯

蒙古色目人第二甲十五名（略）

蒙古色目人第三甲三十二名（略）

汉人、南人第一甲，三名：李齐、李祁、罗谦

汉人、南人第二甲，十五名：聂炳、李之英、宋梦鼎、王明嗣、王充耘、杜彦礼、李炳、李谷、庄文昭、朱文震、张颐、张兑、韩珩、李毅、宇文公谅

汉人、南人第三甲，三十二名：张宗元、任登、雷杭、张周干、陈植、李干、徐祖德、张崇智、赵毅、余观、张桢、鞠志元、成遵、陈毓、周璇、江文彬、程益、邓梓、郭文焕、刘基、刘文□、徐邦宪、许寅、朱彬、于及、艾云中、邓世纶、熊燿、李哲、许广大、张本、张文渊

前述“至顺辛未进士”七人中，有余阙、张宗元、徐祖德、刘基四人名列元统元年进士录。前述至顺三年进士宇文公谅也名列元统元年进士录。

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矛盾：至顺辛未究竟有没有科？若无，为何有诸多记载？若有，为何有至顺辛未进士列入元统元年进士录？

欧阳健先生认为元统元年进士们为了要撇清与权臣燕铁木儿的关系，有意把自己说成是至顺辛未进士，并举宇文公谅、刘基为例^②。这种说法似嫌勉强。理

由之一,至顺共四年,整个至顺年间,燕铁木儿任中书右丞相,权势熏天。《元史·文宗本纪》中记载,文宗对燕铁木儿赏赐金银、田宅等不断,为其出《燕铁木儿世家》书,建生祠,树碑以纪其勋。并亲自临视燕铁木儿生祠。因此,说成是至顺辛未进士,并不能撇清与权臣燕铁木儿的关系。相反,元统是新皇年号,保持元统元年进士称号更有利于撇清与权臣燕铁木儿的关系。理由之二,若辛未、壬申无科,而将元统元年进士说成是无科的进士,是将真进士变成了假进士,是非常愚蠢的行为。刘基、宇文公谅等绝不会为之。理由之三,科举是举国关注的事情,在同时代人面前造假是不可能的事。

愚以为要换一个思路来解决矛盾,即至顺辛未有科,此科所取进士经甄别后被并入元统元年科。

要证明至顺辛未有科,需要对记载为至顺辛未进士的七人细加考察。

余阙,字廷心,唐兀氏,属于色目人。《元史》有传,称其“元统元年,赐进士及第,授同知泗州事”。《元统元年进士录》载其是蒙古、色目人第一甲第二名。光绪《浙江通志》载余阙是至顺辛未进士第一。乾隆《开化县志》卷六“选举”记载有“至顺二年,……余阙榜”。

余阙著有《青阳集》,集前有序,记其为“元统元年进士”。卷五收有《元统癸酉廷对策》。集后附录有宋濂《余左丞传》、程国儒《青阳先生文集序》、李祁《青阳先生文集序》,都说余阙是至顺癸酉或元统癸酉进士。其中李祁也是元统元年进士,序中所记尤详:

元统初,余与廷心偕试艺京师,是科第一甲真三名,三名皆得进士及第。

已而廷心得右榜第二,余忝左榜亦然。唱名谢恩,余二人同一班列,赐宴则接肘同席而坐,同赐绯服,同授七品官。

附录值得注意的还有汪叟(仲鲁)的《余左丞哀辞》,内有“武威余忠宣公,名阙,字廷心,曩以色目第一人登第,内任翰林太常,外官州郡省宪,文章政事,昭昭在人耳目”的记载。^③

看来余阙是元统元年进士无疑,但不能否认余阙是至顺辛未进士第一,汪叟的记载就是支持后者的。试想如果没有进士第一的经历,怎能说他“以色目第一人登第,……昭昭在人耳目”?

张宗元,字仲亨,衢州开化县人。《元史》不载。《元统元年进士录》载其是汉人、南人第三甲第一名。光绪《浙江通志》载其是至顺辛未进士。明嘉靖《浙江通

志》载：“张宗元，字仲亨，衢州人，至顺初进士。高古博雅，罕与俗交，以文辞名。仕为秘书少监，至正间部使者余阙行县，为立兴贤坊以旌之。”乾隆《开化县志》有同样记载。乾隆《开化县志》卷六“选举”记：“至顺二年，仕至秘书监。余阙榜。有传。”张宗元是元统元年进士无疑，关于他是至顺辛未进士记载也较多。嘉靖《浙江通志》说他是“至顺初进士。”至顺统共四年，至顺一年不可能，只能是至顺二年。

徐祖德，字景熙，处州青田人。《元史》不载。《元统元年进士录》载其是汉人、南人第三甲第七名。光绪《浙江通志》载其是至顺辛未进士。光绪《青田县志》卷九“选举”：“至顺四年癸酉李齐榜：徐祖德（十八都石帆人）。 ”

刘基，字伯温，处州青田人。《明史》有传，谓其：“元至顺间，举进士，除高安丞。”与《元史》载余阙、李齐为元统元年进士说法不同，是《明史》修撰者可能已经发现他有至顺辛未进士和元统癸酉进士的两种记载，故采取了含糊的说法。《元统元年进士录》载其是汉人、南人第三甲第二十名。光绪《浙江通志》载其是至顺辛未进士。光绪《青田县志》卷九“选举”：“至顺四年癸酉李齐榜：刘基（九都南田人）。 ”《诚意伯刘基文集》中收录了《龙虎台赋至顺癸酉会试作》、《至顺癸酉会试春秋义》两篇文章。则刘基是元统元年进士无疑。但不能排除他曾是至顺辛未进士。光绪《浙江通志》“元统元年癸酉李齐榜”记有“许广大（天台人，鄞县尹）”。《元统元年进士录》载其是汉人、南人第三甲第三十名。《诚意伯刘基文集》中有《故鄞县尹许君遗爱碑铭》，说“基于许君，相好最甚，欲有言，辄悲不能胜。”但文中却并未说明他们是同科进士，似乎有言外之意。又，刘基出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（1311），《元统元年（1333）进士录》载其二十六岁，其实只有二十三岁，如其至顺辛未中进士，则只有二十一岁。他显然瞒了年龄。

叶颙，字见山，处州青田人。《元史》不载。光绪《浙江通志》载其是至顺辛未进士。光绪《青田县志》卷九“选举”：“至顺四年癸酉李齐榜：叶颙（十一都富川人）。 ”光绪《青田县志》卷十有传：

叶颙，字见山。性至孝。母尝病心痛，扶持不离侧。母怜之，令外息。颙夜潜入，间壁扣心打旦。母终，始举进士，时年六十三。治五经，尤长于书。历官至南安尹，屡考试浙闾。著有《见山集》。

查《元统元年进士录》未载叶颙。《新元史》卷二百三十一《黄许》条记：

初，许及怀玉郑元善，同里叶颙、林定老相师友，三人皆第进士，而许独不遇。

叶颙不见于《元统元年进士录》，说明他不是元统元年进士，只能是至顺辛未进士。

杨观，上饶人。钱惟善《江月松风集》记其“登至顺二年进士第。”欧阳健先生检出杨观事迹又见《汉阳府志》卷之七“宦迹志”：

汉川县知县：元，杨观，上饶人。由翰林检讨出宰。敦本务农，轻徭薄赋，去奸弭盗，修学讲礼，百废咸兴。

可见杨观实有其人，且是进士，不然不会任汉川县知县。但杨观也不见于《元统元年进士录》，只能是至顺辛未进士。

施耐庵，名彦端，字耐庵，泰州白驹人（今属江苏大丰）。他也不见于《元统元年进士录》，只能是至顺辛未进士。

从上述七人的情况来看，实不能否认至顺辛未有科。尤其是叶颙、杨观两例，可以证实至顺辛未确实有科。但辛未有科而《元史》未载，欧阳健先生敏锐地意识到与时局有关^④。但他认为是元统元年部分进士避权臣燕铁木儿嫌而造假，这个原因是找错了。其实原因不在燕铁木儿，而在文宗皇帝。

元泰定帝死后，燕铁木儿发动政变，首创拥立武宗皇帝的儿子。武宗皇帝的长子和世（王束）远在察合台汗国。次子图帖睦尔在江陵，首先来到大都即位，是为文宗。文宗多次敦请其兄来就位，和世（王束）几经拖延，终于来到上都即位，是为明宗。明宗指定文宗为皇太子，但即位数月即“暴死”，文宗又继续接任了皇位。

《新元史》对此评论说：

燕铁木儿立文宗，文宗固让于兄，犹仁宗之奉武宗也。明宗之弑，盖出于燕铁木儿，非文宗之本意。然与闻乎弑，是亦文宗弑之而已。^⑤

文宗接位后，整个至顺年间，内心惶恐不安。至顺元年四月，命西僧在宫中作佛事，直至年底。至顺二年三月，召亳州太清宫道士马道逸、汴梁朝天宫道士李若讷、河南嵩山道士赵亦然，各率其徒赴阙，修普天大醮。文宗要到上都去，先要请和尚作佛事。

至顺元年还发生了政敌作法术的事：

故丞相铁木迭儿子将作使锁住与其弟观音奴、姊夫太医使野理牙，坐怨望、造符录、祭北斗、咒咀，事觉，诏中书鞫之。事连前刑部尚书乌马儿、前御史大夫孛罗、上都留守马儿及野理牙姊阿纳昔木思等，俱伏诛。^⑥

文宗的长子阿剌忒纳答剌疾病缠身，先封燕王，至顺元年十二月册立为皇太

子,至顺二年二月病死。又册立古纳答剌为皇太子,为其祈福不断。

夏四月,命西僧于五台及雾灵山作佛事各一月,为皇太子古纳答剌祈福。诏以泥金畏兀字书《无量寿佛经》千部。

五月丙子,皇太子影殿造祭器如裕宗故事。诏以泥金书佛经一藏。

冬十月甲辰,遣秘书太监王珪等代祀岳镇、海渚、后土。为皇子古纳答剌作佛事,释在京囚,死罪者二人,杖罪者四十七人。^⑦

文宗本人身体也不好,至顺三年八月死,年才二十九岁。

文宗死后,皇后传达他的遗命:传位于明宗之子。明宗次子懿璘质班,年才七岁,至顺三年十月即位,十一月死去。这样,明宗的长子妥欢帖木耳才得以在至顺四年六月即位,是为元朝最后一个皇帝——顺帝。

所以至顺二年、三年,是文宗为了“祈福”的目的而决定连续开科。

文宗死后,违制开科受到廷臣的抨击是必然的。然而进士已公布,且授了官职,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行办法就是进行甄别,将其并入癸酉科。故而元统癸酉科进士有百人之多。

《元史》的修撰者们,对此必定是清楚的。他们认可了元朝朝廷的说法,故在修撰时删去了至顺辛未开科的记录。但仍然留下了后门,在记述延祐至元统癸酉七科之后说:“此有元科目取士之制,大略如此。”

甄别方法不一定是重新参加会试,而可能是根据当时会试名次,加上任职的考核,选出部分直接参加廷对。《元统元年进士录》后附廷对录,可见癸酉科廷对的突出重要性质。

《元统元年进士录》与其他进士题名录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,就是注明了进士的所授官职。按常理,进士录只需记录进士姓名、籍贯和名次,《宋元科举题名录》所收的几种都是这种格式。但若进士原来已有官职,则录入是必须的。至顺辛未科进士已授官职,故他们并入元统癸酉科,《元统元年进士录》才会如此记载。至于此科新取的进士的官职,则可能是后来补入。

叶岷、杨观、施耐庵未能通过甄别,所以不见于《元统元年进士录》。

《施耐庵墓志》载:“公讳子安字耐庵,……为至顺辛未进士。曾官钱塘二载,以不合当道权贵,弃官归里。”与本文所述十分契合。施耐庵至顺辛未中进士,授官钱塘,到至顺癸酉甄别时,恰好是二年。由于“不合当道权贵”,所以未能通过甄别,故而“弃官归里”。

注释:

①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0年第4辑刘冬:《施耐庵生平探考》。

②④《明清小说研究》2012年第1辑欧阳健:《浙江通志》元代选举科目正讹——兼辨“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”之由来。

③《青阳集》注明出于《四库全书·集部·总集类·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三》和《四库全书·集部·总集类·新安文献志卷四十九》。

⑤《新元史》本纪第二十。

⑥《元史》本纪第三十四。

⑦《元史》本纪第三十五。

施耐庵是新诗作家

——谢觉哉评点《水浒传》诗词

辽宁白山出版社 董志新

翻阅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近百年的《水浒》评论资料, 见其评论《水浒》诗词者寥寥无几。偶阅《谢觉哉日记》, 见其评论《水浒》诗词倒有数则, 其眼力识见多有启发人处。

民国时期, 谢觉哉(1883~1971) 曾经多年主编湖南地方报《通俗日报》和《湖南民报》, 后来负责编辑党报《红旗报》, 又编辑《上海日报》。1931 年秋到湘鄂西苏区后主编《工农日报》, 兼任文化部副部长。1934 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。抗战中后期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。

从《谢觉哉日记》中可以看出, 他阅读《水浒》, 评点其诗词曲赋, 其时间集中在抗战后期到抗战胜利之初的 1943 年至 1946 年。其性质属于读书札记一类。在陕北, 地瘠民贫, 人们又忙于抗日战争, 即使在社会高层, 读书条件也很一般。谢觉哉欲求整部《水浒传》而不可得。每次读《水浒》, 只是借到多少读多少。抄记评点《水浒》诗词曲赋, 也不是整体评价, 只是对有兴趣者抄记下来, 略作点拨。这也是日记体读书散记的通常特点。从内容上说, 可以大致把他对《水浒》诗词的评点划分为三个板块: 谈《水浒》诗词的艺术价值、思想内容和作者的创作成就。

有些诗“值得新诗家模仿”

《谢觉哉日记》包括 1919~1922 年、1937~1939 年、1941~1949 年共 16 年的日记。在 1943 年以前, 不见他读《水浒传》的记载。也许是受延安演出平剧《逼上梁山》的影响, 谢觉哉找来《水浒传》阅读。他在 1943 年 4 月 7 日的日记中写道:

看《水浒传》里有些诗, 值得新诗家模仿。俟觅得全书抄下。现记数首于下:

“九里山前作战场, 牧童拾得旧刀枪。顺风吹起乌江水, 好似虞姬别霸王。”(五台山卖酒汉子唱——民间的历史歌)